

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

ZHONGGUO FOXINGLUN

中国佛性论

赖永海 著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

ZHONGGUO FOXINGLUN

中国佛性论

赖永海 著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佛性论·赖永海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4

(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06177-5

I. ①中… II. ①赖… III. ①佛教—研究—中国  
IV. ①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9858号

---

书 名	中国佛性论
著 者	赖永海
责任编辑	王 田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a href="http://www.bookwind.com">http://www.bookwind.com</a>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a href="http://www.ppm.cn">http://www.ppm.cn</a>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 mm×1 304 mm 1/32
印 张	10.5(插页1)
字 数	292千字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177-5
定 价	30.00元

---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 我的佛教研究之路

(1999年版代序)

我的接触佛教，始于童年时代。老家福建闽南一带，自来佛教较盛行，从孩提时代起就常耳闻乃至目睹佛教之超亡荐福、烧香拜拜等，对佛教很早就有一种神秘且敬畏的感觉。后来上了大学，读的是哲学专业，虽然也偶尔涉及佛教，但对它多取敬而远之的态度。1978年报考中国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复试时曾被老师问及：“如果需要的话，录取后把你调整到佛教专业，如何？”记得我当时委婉回答：“最好还是读中国哲学专业。”——因为那个时候，我心目中的佛教仍然是缥缈香烟后的顶礼膜拜和抽签问卜，而我向来较感兴趣的是哲学，尤其喜欢一些思辨的哲理和哲理的思辨，故而对研究佛教颇不以为然。但是，硕士生阶段的三年专业学习，逐渐改变了我对佛教的看法。

首先得感谢我的导师任继愈先生，是他把我引上了学习和研究佛教之路。我在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当硕士生时，虽然读的是中国哲学专业，主攻方向是王船山哲学，但因当时的中国哲学专业设在宗教学系，导师任先生又是儒释道三教兼治之大家，所设课程有佛教概论、佛教史、佛教经典选读等，使我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较系统地接触佛教。

在学习佛教过程中，有一本佛教典籍对我颇有触动，那是作为“附

录”收在任继愈先生之《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一书中的《不真空论》。

《不真空论》系东晋佛教思想家僧肇所撰。僧肇素有“中土解空第一人”之称，而在我的印象中，佛教思想中最为玄奥者，莫过于谈空，所谓“空不异色，色不异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乃是许多文学书籍乃至影视作品显示佛教“禅机”的口头禅，我当时颇想借这本书去窥探一下佛教思想之堂奥。但是，我这个向来颇以“喜欢思辨的哲理和哲理的思辨”自许的读者，在连读了好几遍《不真空论》后，仍然不得书中之要领，这使我开始从理论思辨的角度真正重视起佛教的学说。后来对佛教典籍的较系统研读使我进一步确信，以往被误解为只是超亡送死、烧香拜拜乃至于常被斥为迷信的佛教，实在是一座博大精深的人类思想宝库。

1982年我国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我毅然选择了“中国佛学”的研究方向。先是在导师孙叔平先生的指导下，较系统地阅读了一批佛教典籍。孙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他为我所开列的佛教书目，多是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切入，这对我后来的研究多侧重于佛教中的哲学思想颇有影响。1983年孙先生因心脏病猝发不幸逝世，我又回到任先生门下，继续修完博士生课程和撰写博士论文。这一阶段的学习，完全遵照先生的教导，一是掌握方法，二是大量地研读原著。

就方法而言，笔者以为历史唯物主义不失为研究佛教的一种较好的方法或最好的方法之一，它的长处在于不是就佛教论佛教，就佛经解佛经，而是把佛教的产生与发展、把特定的佛教学说放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进行考察，这对于理解和说明佛教的本质和佛教的发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海内外学术界乃至宗教界也许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把它与纯粹的批判宗教混为一谈，有的则把它与阶级分析的方法等同起来，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造成这种误解有其历史的原因——因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宗教研究几成禁区，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种对佛教乃至一切宗教的毫无分析的谩骂和批判，常常被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这就难怪

人们对这种方法望而生畏。其实，“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坚持以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去说明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社会文化现象，这丝毫不意味着对宗教只能批判否定而不能分析研究，恰恰相反，客观地评价宗教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科学地说明各个历史时期宗教为什么会产生和发展？为什么在某一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是此种宗教而不是那种宗教？各种宗教为什么会这样发展而不是那样发展？例如，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站稳脚跟并持续发展？而在其老家却风光不再？为什么佛教的大小二乘同时传入中国而在汉族地区小乘佛教一直发展不起来，而大乘佛教却能经久不衰？为什么佛教能够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交融合一，而其他的西方宗教却很难做到这一点？佛教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究竟会怎样发展？凡此种种，如果不把佛教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进行考察，而企图就佛教论佛教，是根本做不到的。

当然，正如世界上的许多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对它们的分析研究不能也不应该是单方面的，而应该是多视角、多层面一样，对于佛教乃至一切宗教的研究，方法也不应该是单一的，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之外，诸如人类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乃至于现象学、分析哲学的方法等等，举凡有助于揭示佛教的思想特质、历史发展、社会功能的任何方法，都没有理由反对别人去采用。实际上，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于人们认识和把握对象往往会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如果人们能用尽可能多的方法、从尽可能多的角度去研究佛教或其他宗教，那么，对于佛教或其他宗教的了解和认识就会愈全面和具体，从而使自己的认识更接近于真理——因为人类的认识就是一个不断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不过，就某一个人来说，自然不可能同时采取许多方法去进行研究，各人究竟采取什么方法为好，这应该根据各自的学养和理论准备而定，不可强求一律。

至于研读原著，这是学习、研究佛教的基本功。佛教号称八万四千



法门,经典浩如烟海,没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是难入其门的。如果说笔者在佛教研究方面也曾得到些许收获,在某种意义上说,全然得益于当年硬着头皮、锲而不舍地啃完一部又一部佛经。这里要顺便感谢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的各位教师,特别要感谢当时古籍部主任蒋一斐老师。八十年代南京大学图书馆里,只有一部《大正藏》,按照规定只能到古籍阅览室阅读而不准外借,而我当时住在离校十多公里的紫金山下,如每天往返奔波,着实要浪费许多时间和精力,经蒋老师特批,允许我一部一部地借阅。因为是借来的,阅读时笔记卡片做得特别勤,到临撰写博士论文时,我的佛学笔记竟达厚厚的十六本,读书卡片更是数千张。这些读书笔记和卡片对我后来撰写博士论文的帮助之大,实在是始料未及的。为撰写这部《中国佛性论》,我整整“闭关”三年,潜心佛经,但从提笔撰写,到全书完稿,仅仅用了四十天时间。想起当年撰写论文时,几乎每一个章节,都有数百条资料索引和卡片在等待录用,所以写起来颇有信手拈来、一气呵成的感觉,这与有时为了写一篇应景文章但准备不足时,一提笔三挠腮,冥思苦想,坐立不安适成鲜明对照。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虽然具有一般宗教的许多品格与特征,但又与其他宗教有着若干差异,例如,举凡宗教,都十分注重对人格神的信仰,但佛教既反对纯粹依靠信仰,更否定人格神的存在,它最强调的是“智慧”,注重“慧解脱”,亦即平常所说的“大彻大悟”。佛教的这一特点,导致了历史上许多学者和僧人曾经提出佛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哲学。有鉴于此,对于佛教,可以从更多的角度对它进行研究,特别可以从哲学的乃至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它进行研究,笔者的研究佛教,就较侧重于佛教的哲学思想、理论思辨方面。

与我国高等院校的许多佛教研究者原来多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一样,我的佛教研究,亦是从中国哲学切入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中国佛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确实十分密切,人们曾经对古代中国哲学有过一个概括,所谓“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

学。”此中除却先秦因佛教尚未传入，无从谈论佛教与中国哲学的相互关系，从两汉开始，佛教与中国哲学就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特别从魏晋之后，人们的研究中国哲学，就不能置佛教于不顾。例如，魏晋佛教般若学的传入，起初就是借助于玄学的，后来般若学与玄学合流，最后，般若学因其“不落有无”较之玄学的谈“有”说“无”更抽象，理论思辨更高，遂取代了玄学，成为玄学的出路；到隋唐，由于强大的唐王朝在文化上采取比较开放的政策，中国古代的三大学术流派儒、释、道三家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如果就哲学思想言，尤以佛教为甚，其时之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四大佛教宗派的哲学思想，无论就其体系之宏大，抑或就其思想之精深缜密，都远远超出儒、道二家，因此之故，人们习惯于把隋唐哲学概括为“隋唐佛学”；至于宋明理学，则先贤时哲都称之为“儒表佛里”、“阳儒阴释”。也就是说，它表面上是儒学，骨子里是佛学。宋明理学亦称“新儒学”，其“新”就“新”在以“心性本体”取代了传统儒学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而这种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就是受到佛教佛性本体论思维模式的影响。

通观古代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人们合乎逻辑地得出一个结论，即不研究中国佛教，就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哲学。

其实，不惟中国哲学为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中国古代文化都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例如，素有“华夏文化冠冕”之称的诗、书、画，就受到佛教的极其广泛和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之诗、书、画，向来注重意境、气韵。所谓意境、气韵，也就是一种内在情感与外在境物的交融合一的艺术境界。这种艺术境界往往是一种整体的感受，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只能体悟，不可分析，这种注重“意会”、“体悟”的艺术境界，无疑受到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注重“顿悟”的思想模式的影响。

并非因为自己研究佛教就极力夸大佛教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实际上，佛教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是客观而广泛的，正因为这样，我国的佛学研究，十几年前多停留在中国哲学界，今天已经逐渐发

展到文学艺术、雕塑建筑乃至音乐戏曲诸领域；如果说，十几年前从事佛教研究尚有“钻冷门”之嫌，那么今天人们大可把佛学研究放到整个传统文化研究的大热潮中去进行。

从致力于佛教研究至今已近二十个年头了，在这段时间内，最令我聊以自慰的，就是自己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佛学研究，从潜心研读和整理佛典，到致力于探讨佛教的佛性理论，从研究佛教哲学到探讨佛教与儒学、佛教与诗书画等中国古代各种文化形式的相互关系，每选定一个课题，就全力以赴，务求做出成果。今后，在佛教研究方面将主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利用南京大学的博士点和硕士点，为我国的佛教研究尽可能多培养一些人才；二是如果条件允许，我将对中国佛教中的哲学思想进行一番较深入系统的梳理与探讨，试图撰写一部在体系建构和理论思辨两方面都能有所突破的《中国佛教哲学》，能否成功，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佛教研究的路还很长很远，我将一如既往地走下去！

赖永海

1998年5月

于南京大学南秀村

# 1988年版序

任继愈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共同关心的问题。哲学史最能集中反映时代思潮。哲学史上重要作家和流派,其贡献就在于他们善于提出该时代的重要哲学问题,对有些问题做出了答案。他们的答案对不对,不是主要的(因为他们的答案多半不对,在历史唯物主义出现以前,关于社会历史现象的认识都很肤浅),关键看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其重要性则看它反映该时代共同关心的问题大小、深浅。

佛性论,作为人性论来看,它是中国哲学史上继玄学本体论之后必然出现的一个高潮。它是接着玄学本体论讲的,具有时代特征,它反映了南北朝到隋唐的时代思潮。当时佛教各宗各派,都从自己的立场阐明自己的理论体系。各家的佛性论也成了辨识不同学说流派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把佛性论看作人性论,那就不止是佛教界的事,它实际上具有中国哲学史的普遍意义。也应指出,思想发展的断限,不像刀切斧砍那样齐整。佛性论的提出,不是从南北朝开始的,唐以后,问题的讨论还未结束。只是说,南北朝(东晋也在内)到隋唐这一时期,佛性论在中国确实引起广泛的关注。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号称盛世的应数汉唐。汉唐不只是中国的盛

世,在当时国际行列中,与世界各大国相比,也都是先进的。盛大的汉王朝有着与它的政治地位相称的宏大思想体系,如董仲舒的哲学可以代表。唐朝的国势及当时的国际形象超过汉朝,而思想家似乎不及汉朝,与强大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大相称,不免使人困惑。所以造成这种困惑,在于没有把佛教经学看成中国哲学史的组成部分,没有把佛教经学与儒家经学同等看待,都看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嫡派真传。隋唐时期的中国哲学史是十分丰富的,不仅有柳宗元、刘禹锡等几个唯物主义者支撑局面,在更大的范围内所探讨的心性论,反映着隋唐的时代思潮。那个时代的理论水平相当高,超过了魏晋玄学的造诣。

赖永海同志的《中国佛性论》,从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全局着眼,把佛性论这个题目放在广阔的历史范围内去考察,他阅读了大量原始资料,也尽量参考国外学者成果(虽然可资借鉴的不多),系统地、全面地给以阐述。在中国佛教史的范围作了第一步有意义的探索。当然,中国佛教的重要范畴不止一个“佛性论”,如“缘起论”、“解脱论”、“因果观”……佛性论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当然这部书也不能说已经十全十美。有些看法属于百家争鸣范围,有人未必赞同,还值得进一步讨论;也有些更复杂的问题,要与相邻学科配合,才可以得到满意的结论,不是这一部书可以解决得了的。深信随着学术界佛教思想研究的深入,作者的学力与见解逐步提高,这部书也会得到补充、修订,使之更加完善。活到老,学到老,就是这个道理。

从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佛教研究情况看,这部书有首创的功绩。赖永海同志思深而好学,他有中国哲学史的基础,短短三四年间又在佛教思想研究中取得这样的成果,很不容易。眼看着新中国培养的学者纷纷成材,心里十分高兴。赖永海同志要我为这本书写个序,义不容辞,我愿向读者推荐这部书。

## 作者的话

我的接触佛教，始于童年时代。老家福建闽南一带，自来佛教较盛行，从孩提时代起就常有缘耳闻乃至目睹佛教之超亡荐福、烧香拜拜等，对佛教很早就有一种神秘且敬畏的感觉。后来上了大学，读的是哲学专业，虽然也偶尔涉及佛教，但对它多取敬而远之的态度。1978年报考中国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复试时曾被老师问及：“如果需要的话，录取后把你调整到佛教专业，如何？”记得我当时委婉回答：“最好还是读中国哲学专业。”——因为那个时候，我心目中的佛教仍然是缥缈香烟后的顶礼膜拜和抽签问卜，而我向来较感兴趣的是哲学，尤其喜欢一些思辩的哲理和哲理的思辩，故尔对研究佛教颇不以为然。但是，硕士生阶段的三年专业习，逐渐改变了我对佛教的看法。

首先得感谢我的导师任继愈先生，是他把我引上了学习和研究佛教之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当硕士生时，虽然读的是中国哲学专业，主攻方向是王船山，但因当时的中国哲学专业设在宗教学系，导师任先生又是儒释道三教兼治之大家，所设课程有佛教概论、佛教史、佛教经典选读等，使我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较系统地接触佛教。特别在较系统深入地研读了一些颇富哲理的佛教经典之后，

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以往被误解为只是超亡送死、烧香拜拜乃至于常被斥为迷信的佛教,实在是一座博大精深的人类思想宝库。

1982年我国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我毅然选择了“中国佛学”的研究方向。先是在导师孙叔平先生的指导下,较系统地阅读了一批佛教典籍。孙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他为我所开列的佛教书目,多是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切入,这对我后来的研究多侧重于佛教中的哲学思想颇有影响。1983年孙先生因心脏病猝发不幸逝世,我又回到任先生门下,继续修完博士生课程和撰写博士论文。这一阶段的学习,完全遵照先生的教导,一是掌握方法,二是大量地研读原著。

就方法而言,笔者以为历史唯物主义不失为研究佛教的一种较好的方法或最好的方法之一,它的长处在于不是就佛教论佛教,就佛经解佛经,而是把佛教的产生与发展、把特定的佛教学说放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进行考察,这对于理解和说明佛教的本质和佛教的发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海内外学术界乃至宗教界也许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把它与纯粹的批判宗教混为一谈,有的则把它与阶级分析的方法等同起来,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造成这种误解有其历史的原因——因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宗教研究几成禁区,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种对佛教乃至一切宗教的毫无分析的谩骂和批判,常常被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这就难怪人们对这种方法望而生畏。其实,“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坚持以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去说明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社会文化现象,这丝毫不意味着对宗教只能批判否定而不能分析研究;恰恰相反,客观地评价宗教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科学地说明各个历史时期宗教为什么会产生和发展?为什么在某一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是此种宗教而不是那种宗教?各种宗教为什么会这样发展而不是那样发展?例如,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站稳脚根并持续发展?

而在其老家却风光不再？为什么佛教的大小二乘同时传入中国而在汉族地区小乘佛教一直发展不起来，而大乘佛教却能经久不衰？为什么佛教能够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交融合一，而其他的西方宗教却很难做到这一点？佛教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究竟会怎样发展？凡此种种，如果不把佛教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进行考察，而企图就佛教论佛教，是根本做不到的。

当然，正如世界上的许多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对它们的分析研究不能也不应该是单方面的，而应该是多视角、多层面一样，对于佛教乃至一切宗教的研究，方法也不应该是单一的，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之外，诸如人类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乃至现象学、分析哲学的方法等等，举凡有助于揭示佛教的思想特质、历史发展、社会功能的任何方法，都没有理由反对别人去采用。实际上，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于人们认识和把握对象往往会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如果人们能用尽可能多的方法、从尽可能多的角度去研究佛教或其他宗教，那么，对于佛教或其他宗教的了解和认识就会愈全面和具体，从而使自己的认识更接近于真理——因为人类的认识就是一个不断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不过，就某一个人来说，自然不可能同时采取许多方法去进行研究，各人究竟采取什么方法为好，这应该根据各自的学养和理论准备而定，不可强求一律。

至于研读原著，这是学习、研究佛教的基本功。佛教号称八万四千法门，经典浩如烟海，没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是难入其门的。如果说笔者在佛教研究方面也曾得到些许收获，在某种意义上说，全然得益于当年硬着头皮、锲而不舍地啃完一部又一部佛经。这里要顺便感谢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的各位教师，特别当时的古籍部主任蒋老师。八十年代南京大学图书馆里，只有一部《大正藏》，按照规定只能到古籍阅览室阅读而不准外借，而我当时住在离校十多公里的紫金山下，如每天往返奔波，着实要浪费许多时间和精力，经蒋老师特



批,允许我一部一部地借阅。因为是借来的,阅读时笔记卡片做得特别勤,到临撰写博士论文时,我的佛学笔记竟达厚厚的十六本,读书卡片更是数千张。这些读书笔记和卡片对我后来撰写博士论文的帮助之大,实在是始料未及的。为撰写这部《中国佛性论》,我整整“闭关”三年,潜心佛经,但从提笔撰写,到全书完稿,仅仅用了四十天时间。想起当年撰写论文时,几乎每一个章节,都有数百条资料索引和卡片在等待录用,所以写起来颇有信手拈来、一气呵成的感觉,这与有时为了写一篇应景文章但准备不足时,一提笔三挠腮,冥思苦想,坐立不安适成鲜明对照。

从致力于佛教研究至今已近三十个年头,在这段时间内,最令我聊以自慰的,就是自己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佛学研究,从潜心研读和整理佛典,到致力于探讨佛教的佛性理论,从研究佛教哲学到探讨佛教与儒学、佛教与诗书画等中国古代各种文化形式的相互关系,每选定一个课题,就全力以赴,务求做出成果。自2004年起,我又与一批长期致力于佛教研究的同仁们一起,编撰了海内外第一部完整的《中国佛教通史》(总15卷,650万字),对二千年来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经典依据、思想义理,乃至文物制度、民众信仰等各个方面进行较系统、深入的分析 and 论述,但愿它的问世,对于进一步推动佛教研究的深入开展能有所助益。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佛教研究的路还很长很长,我将一如既往地走下去!

赖永海

2009年冬于南京大学